

# 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

——兼评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对民主化的影响

李文刚

**内容提要** 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源于各民族对部落战争、部落主义和封闭落后的内忧，及对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和文化侵蚀外患双重压力的回应。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寻求本民族复兴、和平及发展方面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们很快被“政治化”，成为政治家们争权夺利的便利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的地方民族组织大量涌现，尤其是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它们对尼日利亚的民主化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地方民族组织以和平方式提出合理诉求，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有助于推动民主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民族组织以暴力手段谋求利益，有的甚至要求本民族脱离尼日利亚独立或按照民族界限重组联邦，这些影响对国家民族建构程度较低的尼日利亚民主化非常不利。

**关键词** 地方民族组织 原因 民主化 影响

**作者简介** 李文刚，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英国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 100007）。

## 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地域、民族为基础的一些组织在尼日利亚多个城市大量涌现。理查德·斯克拉指出，这些“民族协会”（ethnic group association）或称“部落联盟”（tribal union）是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乡村的一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各种新观念和通过这一渠道从城镇传递到乡村。<sup>1</sup>在尼日利亚所有民族中，只有豪萨人没有建立这种地方民族组织，这或许反映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凝聚和统一的力量在豪萨人社会中的牢固地位。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组织在尼日利亚的最高层次就是“泛部落”组织（pan-tribal association），即将一个民族的不同部落尽可能地按照文化和语言上的亲缘关系联合起来，主要目的是促进本民族的教育发展，也有一些地方民族组织变得高度政治化。<sup>④</sup>

尼日利亚第一个泛部落组织成立于1928年，是由东部一些讲伊比比奥语（Ibibio）的人建立的，

<sup>1</sup> See Richard L.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ower in An Emergent African N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4-65.

<sup>④</sup> See *Ibid*

主要为了促进伊比比奥人的教育发展。20世纪30年代,伊格博人的组织在一些大城市如哈科特港 (Port Harcourt) 和拉各斯等城市开始建立,其中1934年建立的拉各斯伊博联盟 (The Ibo Union of Lagos) 后来成为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 (NCNC) 的支柱力量之一。<sup>1</sup> 伊格博人组织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政治诉求。为了加强自己的影响力,拉各斯伊博联盟随即决定成立伊博联邦联盟 (Ibo Federal Union), 以便统一尼日利亚所有伊博人的地方性组织。

1945年,居住在英国的一群约鲁巴族青年发起了一场旨在促进约鲁巴人团结的运动,最终促成出现以约鲁巴人为基础的民族组织。促使泛约鲁巴族组织出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一些开明的约鲁巴族首领渴望尽早结束自19世纪以来就困扰着约鲁巴地区的部落对抗和战乱;其二,为了改革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在约鲁巴人头上的威权统治体系。<sup>④</sup> 此外,该运动的出现与奥巴费米·阿沃勒沃 (Obafemi Awolowo) 的个人影响力密切相关。1945年,在英国留学的阿沃勒沃撰写了一本名为《尼日利亚自由之路》的著作,对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统治政策提出批评,倡导各民族争取地方自治 (home rule) 的权利。阿沃勒沃认为,尼日利亚应建立联邦制国家来统一建立在民族亲缘 (ethnic affinity) 关系基础上的若干国家;泛部落团结是政治进步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要彻底摧毁部落主义 (tribalism) 和宗族团结 (clannishness)。1945年,阿沃勒沃与其他几名约鲁巴人在伦敦发起成立“奥杜杜瓦后裔协会” (Egbe Omo Oduduwa)。为壮大自身实力,1948年2月,该协会对外宣称是一个非政治性文化组织,向约鲁巴族男女都开放。同年6月,一些约鲁巴族知名人士在有“约鲁巴人摇篮”之称的伊费 (Ifé) 集会,正式宣布成立奥杜杜瓦后裔协会。

奥杜杜瓦后裔协会虽自称在政党政治中保持中立,但在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 (NCNC) 看来,该协会在政治上是一个威胁,于是便通过其宣传喉舌《西非领航员》 (West African Pilot) 发表了一篇劝说人们不要相信奥杜杜瓦运动的专栏文章。1948年6月中旬,支持阿齐克韦和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的约鲁巴人成立了约鲁巴联邦联盟 (Yoruba Federal Union), 反击奥杜杜瓦后裔协会的宣传。该协会发言人指责约鲁巴联邦联盟是伊格博人控制的组织,目的是想从政治上分裂约鲁巴人。与此同时,伊格博人被广泛动员起来支持阿齐克韦。拉各斯的伊格博人组织和约鲁巴人组织纷纷举行集会,恶语相加,互相攻击,双方的舆论宣传工具《西非领航员》和《每日新闻》 (Daily Service) 也加入了这场争斗。

1948年12月,泛伊格博人大会在哈科特港召开,会议宗旨是要将讲伊格博语的各个群体依照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自由宪章》组建为一个政治组织。这次大会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伊博国家联盟 (Ibo State Union) 的建立。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虽自称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但阿齐克韦同时担任伊博国家联盟主席,该联盟多名成员在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中担任要职。这种状况使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其反对者认为它是一个受伊格博人控制的政党。奥杜杜瓦后裔协会创始人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但他们也看到传统部落酋长的影响力,因此,便努力说服约鲁巴地区的酋长加入该组织。在看到泛约鲁巴人团结所形成的强大文化号召力和约鲁巴青年精英们的政治、经济实力后,许多酋长纷纷加入。奥杜杜瓦后裔协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调解酋长与酋长、酋长与社团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尼日利亚东部伊格博人地区的伊博国家联盟也扮演了调停民族冲突和维持和平的角色。泛民族组织的创建,标志着尼日利亚社会和政治一体化的开始。但是,这些泛民族运动和组织很快被政治化,“具有党派性质的文化民族主义将吞没倡导尼日利亚团结的民族主义理想”<sup>(四)</sup>。

尼日利亚独立前,北区豪萨-富拉尼人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组织,但中部地带 (Middle Belt) 情

<sup>1</sup> 1948年,拉各斯伊博联盟经历了伊博联邦联盟阶段,已发展成为伊博国家联盟 (Ibo State Union)。

<sup>④</sup> See Richard L. Sklar op cit, pp. 65-66.

<sup>(四)</sup> Ibid., p. 72

况却大不相同。许多人往往习惯于误将北区看做一个单一整体而忽视这一重要事实。<sup>1</sup> 中部地带面积占北区面积一半多，主要包括北区的 6 个南部省。从民族构成与宗教信仰来看，中部地带大致可分为 3 种类型：（1）所讲语言不同于豪萨语的民族，如比罗姆族（Birm），他们一般信仰基督教或非洲传统宗教；（2）信仰伊斯兰教，但讲自己的民族语言，如努佩人和伊洛林的约鲁巴人；（3）更多的是既非穆斯林，又不讲豪萨语的民族，如蒂夫人。北区中部地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组织有 1938 年成立的蒂夫族进步联盟（Tiv Progressive Union）<sup>④</sup> 和 1945 年成立的比罗姆族进步联盟（Birm Progressive Union）<sup>⑤</sup>。此外，还有几个少数民族也建立了地方民族组织，且最终演化成北区的几个小政党。<sup>⅔</sup> 尼日利亚北区中部地带民族组织之间的凝聚力虽然很弱，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运动的势头却很强劲，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民族运动得到两个较大民族蒂夫族和比罗姆族的一贯支持，因为这两个民族担心豪萨—富拉尼人会凭借数量优势对他们实行文化霸权和政治奴役。此外，众多基督教教会组织在尼日利亚中部地带的活动对该地区少数民族运动兴盛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sup>½</sup> 豪萨—富拉尼人起初虽没有建立民族组织，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他们所建立的北方人民大会党（NPC）却带有浓厚地方民族主义色彩。此外，北区一些少数民族组织也依附于北方人民大会党。<sup>¾</sup>

综上，尼日利亚独立前的地方民族组织是在内忧（部落战争、部落主义和封闭落后）和外患（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和文化侵蚀）的双重压力下，由尼日利亚新兴阶级的代表（律师、医生、商人、政府公务员等）以及一些有远见的酋长建立的，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寻求本民族复兴、和平及发展的一些积极意义。斯克拉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些地方民族组织的价值在于它们突破狭小的地域、传统观念，具有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征。<sup>⑥</sup> 但是，这些地方民族组织的领导人非常清楚，未来全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不在他们的聚居地，而在整个国家。因此，这些具有浓厚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很快被“政治化”，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所利用，成为他们争夺独立后尼日利亚国家政权的工具。尼日利亚独立后政局动荡、政变频仍与这一现象不无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地方民族的兴盛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地方民族组织的兴盛及原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出现大量以民族或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地方民族组织。我们可将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大民族的组织；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组织。前者主要包括尼日利亚东南部伊格博人的伊格博青年运动（Igbo Youth Movement）、伊格博人拯救阵线（Igbo Salvation Front）、伊格博人拯救理事会（Igbo Redemption Council）、伊格博人青年联合理事会（Federated Council of Igbo Youths），以及实现比夫拉主权国运动（Movement for Actualis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iafra MAS-SOB）；西南部约鲁巴人的埃格贝—阿非尼弗热（Egbe Afeifere）<sup>(t)</sup>、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O’Odua

<sup>1</sup> 一些人在看待尼日利亚西区和东区时，也容易犯同样错误。这就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提到尼日利亚民族问题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此问题简化为三大区（或南、北方）的矛盾、三大族之间的矛盾或北方穆斯林和南方基督徒的矛盾。这种过于简单的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差异。

<sup>④</sup> 1944 年成为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的组成部分之一。

<sup>⑤</sup> 比罗姆族进步联盟除倡导泛比罗姆族团结外，还要求在乔斯高原（Jos Plateau）侵占比罗姆人的土地开采锡矿的英国公司向比罗姆人做出公正赔偿。

<sup>⅔</sup> 参见李文刚：《尼日利亚民族问题与民主化进程研究》（第四章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5 月。

<sup>½</sup> See Richard L. Sklar op. cit., p. 348.

<sup>¾</sup> See ibid., p. 386.

<sup>⑥</sup> See ibid., p. 72.

(t) “Egbe Afeifere”，是约鲁巴人的一个支持民主的组织，其主要目标是要求重组联邦、实行地区自治和设立独立的全国大会，但其议事日程完全以约鲁巴人的利益为中心。

Peoples' Congress OPC)<sup>1</sup>；北部豪萨-富拉尼人的图拉基委员会 (Turaki Committee)、团结和发展基金会 (Unity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北方长者论坛 (Northern Elders Forum)、阿雷瓦人民代表大会 (The Arewa Peoples Congress APC)，以及伊斯巴卫队 (The Hisbah Guards) 等。少数民族的组织则数不胜数，特别是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如尼日尔河三角洲伊乔族生存运动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Ijaw Ethnic Nationality in the Niger Delta MOSEND)、伊乔全国大会 (Ijaw National Congress NC)、乌罗博联盟 (Urhobo Union)，以及在阿巴查军政权时期 (1994~1998年) 影响就很大的奥贡尼人生存运动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Ogoni People MOSOP)，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大量涌现，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 巴班吉达-阿巴查军政权 (1985~1998年) 对全国性多民族组织的压制和对地区性地方民族组织的鼓励，进一步增强了尼日利亚本已突出的民族认同政治

为了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统治，巴班吉达和阿巴查军政权均接二连三颁布法令，对一些全国性多民族组织进行不同程度的禁止和压制，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促进尼日利亚实行民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如尼日利亚劳工大会、大学学术职员联盟、尼日利亚律师协会、尼日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尼日利亚全国记者联盟等。<sup>④</sup>与此同时，军政权也不可能全靠镇压来维持统治，它也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来维持社会稳定。因此，鼓励自助性地方民族组织、合作社和妇女组织的发展，成为多届军政权的共同做法。

(二) 尼日利亚国家政权长期由北方人控制，<sup>⑤</sup>约鲁巴人和伊格博人感到政治上被边缘化，一些人对尼日利亚国家认同很低，甚至谋求民族独立

1993年总统大选结果被巴班吉达军政府宣布无效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人聚居区民众抗议时间最长、程度最激烈。许多约鲁巴人认为，赢得大选的约鲁巴人阿比奥拉被剥夺了胜利，不仅表明豪萨人控制的军政权不愿交权，也意味着约鲁巴人将继续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1994年，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 (OPC) 就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带有约鲁巴民族主义鲜明色彩的地方民族组织将其宗旨定为促进和保护约鲁巴人利益；将约鲁巴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培育约鲁巴团结；寻求联邦重组等。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在活动中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它很快被人们认为是尼日利亚最极端的组织之一。1999~2002年，在拉各斯州，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借口打击犯罪同豪萨商人发生暴力冲突，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1999年7月，在拉各斯附近的萨加古，一名豪萨妇女被怀疑亵渎约鲁巴人的奥沃节 (Owo Festival) 而被杀死，由此引发冲突，50多人死亡。豪萨柯拉果商人逃回卡诺后，讲述了他们在萨加古的恐怖经历，又在卡诺引发了针对约鲁巴人的报复行动，致使数百人死亡。同年11月，约鲁巴人和豪萨商人为争夺拉各斯一处市场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据悉百余人死亡。<sup>1/4</sup>这几起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族际冲突中出现的新情况，因为以往主要民族间的冲突双方是豪萨-富拉尼人和伊格博人，而这几起却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不仅如此，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的《奥杜瓦权利法案》(O' Oduduwa Bill of Rights) 还提出对尼日利亚联邦进行重组，所有约鲁巴人应组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召开全国大会来决定尼日利亚的政治未来。<sup>1/2</sup>虽然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在1999年被尼日利亚政府取缔，但影响力依然很大，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

<sup>1</sup> 有的文献将该组织的名称写做“奥杜杜瓦人民代表大会”(The Oduduwa Peoples Congress OPC)。See Augustine Ikelegbe, "The Perverse Manifestation of Civil Society: Evidence from Nig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9, No. 1, 2001, p. 15.

<sup>④</sup> See Adedayo O. Olikoshij, "Associational Life", in Larry Diamond, Anthony Kirk-Greene and Oyeleye Oyediran, eds., *Transition without End: Nigerian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under Babangid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388-396.

<sup>⑤</sup> 1992年12月，尼日利亚北方知名人士马伊塔马·苏勒 (Alhaji Maitama Sule) 在卡杜纳 (Kaduna) 发表题为《为什么要北方领导》(Why the North Leads) 的演讲，其中甚至编造了一个神话，认为豪萨-富拉尼人有天定的统治权，其他民族只能统治其他世俗地区。Ukwo Uko, "Politics, Ethno-Religious Conflic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1, 2003, p. 135, footnote 14.

<sup>1/4</sup> Ukwo Uko, op. cit.

<sup>1/2</sup>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Want in the Midst of Plenty", *Africa Report*, No. 113, July 2006, p. 28.

和其他类似组织念念不忘的“约鲁巴事业”将是尼日利亚国家民族一体化的一大障碍。

1999年5月,约鲁巴人奥巴桑乔当选总统,尼日利亚实现了“权力南移”。尼日利亚北方人对这一事件的反映是,北方的利益已受到威胁。他们很快组建了阿雷瓦人民代表大会(APC),目标包括保护北方利益,统一北方,反对和防止尼日利亚因众多地方民族组织的活动而分裂,打击任何对北方的威胁。<sup>1</sup>与“伊斯巴卫队”的宗教色彩不同,阿雷瓦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与北方的宗教事务、特别是伊斯兰教法保持着一定距离。面对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在拉各斯和奥贡州等地对北方豪萨人的攻击,阿雷瓦人民代表大会的反应往往是“以暴易暴”,让在北方的约鲁巴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实现比夫拉主权国运动自2000年以来就非常活跃,它其实是一个试图建立伊格博人独立国家的分裂组织,其成员经常身穿当年比夫拉士兵的军服,升起比夫拉分裂主义者的旗帜,并散发标明“独立比夫拉国家”边界的地图。<sup>④</sup>2006年3月,在尼日利亚人口普查前,该组织袭击了安南布拉州的一个警察局,并宣称伊格博人不应被统计在内,因为他们是“比夫拉人”(Bifrans),而不是尼日利亚人(Nigerians)。<sup>⑤</sup>实现比夫拉主权国运动寻求支持的途径有二:首先,招收对比夫拉内战没有什么记忆的失业年轻人,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尼日利亚军方对“一个尼日利亚”的坚定信念,容易被地方民族主义的激情所蛊惑。其次,利用内战后伊格博人感到被排除在尼日利亚政治之外的挫败感,来鼓动伊格博人地方民族主义,因为即使是不愿谋求独立的伊格博人,“比夫拉共和国”的影子在他们脑海中也不会轻易地被抹去,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建构程度很低的尼日利亚。<sup>⑥</sup>

### (三) 石油产区的少数民族普遍感到自己在经济领域被边缘化,基本权利无保障

这一方面体现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问题上,包括产油区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国家、跨国石油公司,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3类矛盾和冲突的背后,就是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出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组织。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要求得到国家石油收入的更多份额;另一类则要求自己控制当地石油资源,这实际上是要求独立。几十年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公民社会组织一直以和平方式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出产石油的地方该对石油资源享有更多控制权,但都遭到政府否决或镇压。长期关注石油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尼日利亚学者西里尔·奥比(Cyril Obi)指出,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结束时,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就失望地发现,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央,谁在联邦政府掌权,谁就能控制和转移财富。<sup>⑦</sup>这些少数民族还发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和权利。我们可以举河流州(Rivers State)奥贡尼人运动(1990~1993年)<sup>⑧</sup>和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Ethnic Minority Rights Organization of Africa EMROAF)的例子加以说明。

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是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MOSOP)中产生的一个组织,名称之所以用“非洲”而不用“尼日利亚”,用意可能有两个:一是表明少数民族问题超越了尼日利亚国界;二是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一个大国,该组织希望能为非洲遭受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框架。<sup>⑨</sup>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提出了重组尼日利亚的建议,即按照民族界限创建新国家来解决尼日利亚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按照该组织的设想,尼日利亚的下列11个民族应当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伊乔、

<sup>1</sup> See Augustine Ikegbe op. cit., p. 17.

<sup>④</sup> See Ibid

<sup>⑤</sup> See M. Paul “Job not easy for Nigerian census taker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4, 2006.

<sup>⑥</sup>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igeria’s Faltering Federal Experiment”, *Africa Report* No. 119 (Oct. 2006), p. 16.

<sup>⑦</sup> See Cyril Obi “Oil and Minority Question”, in Abubakar Mamoh & Saïd Adejumo ed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Niger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p. 100–101.

<sup>⑧</sup> 参见李文刚:《浅析尼日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为中心》,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第22–28页。

<sup>⑨</sup> See E. Ike Udugu “The Altruism of Ethnonationalism in Nigerian Politics: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XIX, 3–4, 1994, p. 164.

约鲁巴、伊格博、豪萨-富拉尼、伊比比奥、卡努里、埃多、努佩、乌罗博、蒂夫和格巴伊 (Gbagyi)。尼日利亚应当是上述各国组成的一个松散联邦,以便实行真正联邦制,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并让其拥有政治自决权和对资源与环境的控制权。<sup>1</sup> 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所设想的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东西反映出对民族国家的一些设想,其实是建立在尼日利亚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基础之上。

#### (四) 民族、宗教认同仍容易被政客们操纵,并被用于政治目的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大量地方民族武装组织中,许多组织与一些州长保持着密切关系,有的组织本身就是由州政府建立或受州政府资助。一些组织被州长用来争权夺利、恐吓政治反对派或打击其他组织。例如,“巴卡西男孩”(Bakassi Boys)是伊格博人控制的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虽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在尼日利亚一些“大人物”(Big Men)<sup>④</sup>利用下,已蜕变为一个恐怖组织。它自称扮演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但其烧杀劫掠的残忍手段使自己臭名昭著,令当地居民颇为恐惧。该组织不时被一些州用做州治安员,1999~2003年成为安南布拉州“合法”的“安南布拉州治安大队”(Anambra Vigilante Service),被认为是当时州长姆巴迪努朱(Chinwoke Mbadinuju)的暗杀工具。2004~2005年,姆巴迪努朱的继任者恩基格(Chris Ngige)继续雇用“巴卡西男孩”成员作为自己和其他政府高官的保镖。<sup>⑤</sup>阿比亚州(Abia State)也有类似的武装组织。

在尼日利亚北部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的州,多个穆斯林自愿组织打着确保和监督“沙里亚法”执行的旗号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巴卫队”(The Hisbah Guards)。2000年,赞法拉州(Zamfara State)州长萨尼·耶里马(Sani Ahmed Yerima)率先宣布在该州实行伊斯兰教法。在两年里,尼日利亚北方11个州纷纷仿效。起初,一些穆斯林认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可以恢复联邦政府和警察无法保证的社会秩序,抵制西方文化对尼日利亚传统文化的日益侵蚀,保证广大尼日利亚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认同。尽管“沙里亚法”强调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但实行“沙里亚法”的州大多依然比较贫困,无以为生的穆斯林青年很容易将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以极端方式发泄出来。此外,“沙里亚法”的一些酷刑也引起穆斯林民众的一些不满。在卡诺州、赞法拉州等地,伊斯巴卫队在州长的支持下常常对普通穆斯林民众施以酷刑,并同联邦警察多次发生冲突。2006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宣布伊斯巴卫队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一些州的伊斯巴卫队领导人,引起这些州州长的不满。

#### (五) 尼日利亚安全部门的不作为及小型武器泛滥助长地方民族组织的“军事化”

尼日利亚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军事大国,其军队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尼日利亚军警往往被当地人视为政府派来保护油气设施的亲信,保护当地民众充其量是次要职责。<sup>¼</sup> 尼日利亚军警在当地人心目中印象不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他们曾在军政权时期多次镇压过少数民族运动;其二是一些州的安全人员待遇低、装备差、士气低,官员常靠索取贿赂或从事副业养家糊口,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sup>½</sup> 此外,失业青年大量增加,他们对联邦和州政府的允诺感到失望,这些都导致多个武装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往往通过袭击石油设施、绑架人质索要赎金、盗取和走私原油来换取武器。

<sup>1</sup> See E. Ike Udogu, op. cit., p. 165.

<sup>④</sup> 在尼日利亚政治中,许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始于传统的、以民族为基础的权力框架,但他们日后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和门路将他们汇聚到一个由全国各地精英组成的俱乐部,这些人逐步掌控尼日利亚的全国政治。这些“大人物”也被称为“教父”(godfathers),尼日利亚政治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教父政治”(godfather politics)。See Richard L. Sklar, Ebenezer Onwudike and Darren Kew, “Nigeria Completing Obasanjo's Leg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3, July 2006, p. 105.

<sup>⑤</sup>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igeria's Faltering Federal Experiment”, *Africa Report* No. 119, Oct 2006, p. 17.

<sup>¼</sup>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Swamps of Insurgency: Nigeria's Delta Unrest”, *Africa Report* No. 115, August 2006, p. 5.

<sup>½</sup> See ibid., pp. 6-10.

## 地方民族组织对民主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兴盛有深刻背景,各个组织的诉求各不相同,采取的手段也有和平与暴力之分,或二者兼有。一些组织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提出它们的诉求,其中也不乏合理成分,有些涉及尼日利亚政治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是尼日利亚政治改革不可避免的。这些地方民族组织的活动,有利于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一些少数民族组织对少数民族权利、发展和环境的关注,对推进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起了促进作用,推动着尼日利亚民主化艰难前行。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民族组织采取极端手段,诉诸暴力,谋求民族独立或国家分裂,有些成为政客们的工具,甚至沦为恐怖组织,如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军(Niger Delta Liberation Army)多次威胁要刺杀尼日利亚主要反腐败机构“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mes Commission, EFCC)的主席,要求政府释放涉嫌洗钱的巴耶尔萨州前州长和一些激进组织领导人。上述组织对尼日利亚民主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 不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国家一体化

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国家发展缺少的不是资源,也不是劳动力,而是较长时期的稳定,尼日利亚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尼日利亚已经搭建了民主的各种框架,但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时间去实践、充实和完善。没有政局的稳定,民主化和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对尼日利亚来说,基于民族、地域或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组织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引发地区乃至全国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家民族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尼日利亚不得不努力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如果没有健全的民族国家,民主化就失去了载体。诸多学者从许多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影响民族-国家构建的因素(如民族、宗教因素)做了分析,目的是希望尼日利亚早日跨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但在尼日利亚,一些组织却主张按照民族界线来分割国家。例如实现比夫拉主权国运动谋求国家的分裂,奥杜瓦人民大会和伊乔青年理事会要求对国家结构进行根本性的重组,若如此,统一的尼日利亚将不复存在。<sup>1</sup>事实上,国家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对整个地区局势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尼日利亚或许可以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的悲剧,但考虑到该国的面积和资源,其内部冲突进一步升级无疑会使西非次地区本已脆弱的安全局势更加动荡”<sup>④</sup>。

### (二) 不利于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对尼日利亚政治的负面影响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地方民族主义对尼日利亚政治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减弱,但并不排除其在某些地域、某个时期内被操纵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有实力的政治家都与日益复杂的民族、宗教冲突有牵连。一些涉嫌腐败的官员往往鼓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奥巴桑乔政府的反腐败行动,认为政府在反腐败方面搞民族歧视。有些州长违反宪法中关于州不能拥有独立安全部队的规定,私自组建或支持各自州的“治安部队”,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民主制度和法治的破坏。此外,一些州长还利用本民族的民兵或“治安部队”在选举前后为这些州长助阵,打击异己,维护这些州长的地位。这些都有悖于民主的基本要求,对民主化的危害不言而喻。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樊小红)

<sup>1</sup> See Ukiwo Ukoha, op. cit., p. 127.

<sup>④</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igeria’s Faltering Federal Experiment”, *Africa Report*, No. 119, Oct 2006, p. 1.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Nigerian Ethnic Organizations

### —The Impacts of Nigerian Ethnic Organizations on Democratization

*Li Wengang*

pp. 25– 31

The Nigerian regional ethnic organizations originated from the response to the dual pressures of their internal troubles of the tribal wars, tribalism and the closed social backward, as well as of the external ones of political slavery,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cultural eros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se organizations played active roles in fighting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in the search for their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ace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were soon politicized and became tools of the political scrambles for power.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ethnic organizations in Nigeria since 1990s, especially in the oil-rich Niger Delta

region. They have had far-reaching and complex impacts on the democratization in Nigeria: on the one hand, some have reasonable demands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duc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by peaceful mean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ny have sought their interests by means of forces, and some even demanded that their independent nations out of Nigeria should be established or the current federal nation should be reorgan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nic boundaries, which have largely affected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Nigeria without well-constructed state and nation.

## Probing into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Jiang Zhen*

pp. 47– 52

As the start of the Iranian politics,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profoundly impact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ran. With the political creed of the Faqih ruling authority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established political system in Iran is destined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slamic and conservativ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ew regime's Islamic essence, a series of the Islamic power institutions have come into being, which has, to some extent, superposed the original national

authorities, interrupted the normal execu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twisted the reforms.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hugely influenced Iran's social ideology and brought about fury debates in Iran. It has been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 and debate focus between the reformists and conservatives on Iran's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 to present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public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Faqih constitution and make the two in accordance.

## Perceiving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rough Ali Shariati's Thought

*Wang Zezhuang*

pp. 53– 60

Ali Shariati is one of the three well-known theorists i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st in the early Islamic revolution. However, his radical ideas have, in essence, the similar nature and consistency with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the third world theory (that is, so-called "the third-worldism"), showing strong

tendency of emotional "nationalism" and outstanding "socialism". The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nature presented by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s we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i Shariati's thought, with the latter reflecting the nature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complexity.